

唐代版印实录与文献记录

李致忠

唐代是雕版印刷技术的发轫期,现存实物和文献记载表明,大约在七世纪的中叶或下半叶,也就是初唐时期,中国已经有了雕版印刷的技术。其后的盛、中、晚唐,此项技术缓慢发展,日益壮大。雕版印书的地点,除长安、洛阳两京外,以长江流域较盛行。从上游的剑南东西两川,到中游的江南东、西道,直到下游的淮南,都有这种技术在流行。雕印的内容,涉及字书、医书、佛书、道书、历日、阴阳杂说、占梦相宅、九宫五纬等诸方面;规模可以一次雕印三十卷之多的《玉篇》,可以一次印制多达数千部的《刘宏传》;质量则出现了印制精美的唐懿宗咸通九年(868)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但因时代久远,其实物流传至今者,已是吉光片羽。实物失传,而文献有明确记载者亦甚可宝。今刊录两者,以助出版史之研究。

1. 宋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卷二〇四《唐纪》二十记载武则天天授二年(691)十月以印纸遗王庆之

天授二年“冬十月己酉,长倩、辅元、通等皆坐诛。王庆之见太后,太后曰:‘皇嗣我子,奈何废之?’庆之对曰:‘神不散非类,民不祀非族。今谁有天下,而以李氏为嗣乎!’太后谕遣之。庆之伏地,以死泣请,不去。太后乃以印纸遗之曰:‘欲见我,以此示门者。’自是庆之屡求见,太后颇怒之,命凤阁侍郎李昭德赐庆之杖。”

此处出现了“印纸”一词,这种“印纸”显然是进出宫禁的凭证。出进宫禁,十分不易,没有凭证,难得进出。而这种凭证一定得格式统一,不易仿造,所以需要印刷。《旧唐书》卷四十九《食货志下》记载:“市牙各给印纸,人有买卖,随自署记,翌日合算之。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,验其私簿,无私簿者,投状自集。”其意是说,市场贸易,有牙行作为中介。对这些中介人要各发给“印纸”,以便随时登记贸易情况,第二天进行合算。这种“印纸”似乎又是交易纳税的凭证。这种东西也是需要量大,格式要求统一,不易伪造,所以需要印刷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十三《宋纪十一》记载太平兴国七年(982)五月诏:“京朝官出使,所给印纸,委本署以实状书,不得增减功过,阿私罔上。其关涉书考之官,悉署姓名,违者论其罪。”《资治通鉴后编》卷十《宋纪十》有同样记载。表

明唐宋时期对官吏的考核是很严格的。这里的“印纸”又显系官吏考核的登记表。这种登记表也是用量较大,格式需要统一,所以用雕印的办法印制。由此可知早在七世下半叶,中国已有了雕版印刷术。

2. 唐高僧法藏《华严五教章》、《华严经探玄记》记载印刷术流行状况

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曾写过《有关中国印刷术的起源》一文,分上下两期,发表在台湾《故宫文物》月刊1988年第6、7期上。他引据唐代高僧法藏在《华严五教章》和《华严经探玄记》中讲经借喻的记载,提出了印刷术中国初唐发明说。《华严五教章》(《大正大藏经》第四十五卷所收)曰:“教起前后,是故依此普法。一切佛法并于第二七日。一时前后说,前后一时说,如世间印法,读之则句义前后,印文则同时显现。同时前后,理不相违,当知此中道理亦尔,准以思之。”法藏所著之《华严经探玄记》(《大正大藏经》第三十五卷所收)卷二曰:“二摄前后者有三重,一于此二七时。一于此二七时,即摄八会。同时而说,若尔何故会有前后?答如印文,读时前后,印纸同时。”法藏是《华严经》的传人,他以华严宗独特的教理普法,以一即一切,一切即一的道理解释经义。为了阐明这种玄深的教理,他常常深入浅出,借助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事物来比喻,从而达到让听者理解的目的。神田喜一郎引证的两段话,就是这样的比喻。“如世间印法,读之则句义前后,印文则同时显现。”“同时而说,若尔何故会有前后?答如印文,读时前后,印纸同时。”其意是说讲解佛法经义有前有后,如同世间雕板印刷文稿一样,读它的时候句义上总有前后之分,可是印制它的时候,文字在纸上却是同时刷印出来的。让人听来一下就明白。所以恰如其分的比喻,确能解释深奥的玄理。法藏,字贤首,俗姓康,康居人。生于贞观十七年(643),示寂于太极元年(712),享年七十岁。日人松原恭让所撰写的《佛书解说大辞典》中说法藏的《华严经探玄记》撰写在他四十五至五十岁之间,如此则被神田喜一郎推定在唐中宗嗣圣四年,其实已是武则天垂拱三年(687)到天授三年(692)。但据华严宗的专门家日人汤次了荣所撰《华严五教章讲义》所说,法藏撰写《华严五教章》是在写《华严经探玄记》之前。据此神田喜一郎则推断《华严五教章》当完成在唐高宗仪凤二年(677)前后,那时法藏不过三十来岁。在唐高宗时代,世间印书之法就能被引来作为解经的比喻,让佛弟子们能听懂,显然在此之前和在此之际,这种雕版印书活动一定是不稀见的现象,否则就无资格被借喻而为人释惑解疑。果如此,中国雕版印刷始于初唐,即七世纪的中下半叶则毋庸置疑。

3. 《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》(图一)唐武则天久视元年至长安元年(700—701)刻本

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石塔内发现了《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》一卷,经内有唐武则天时特有的制字。经考证,此经由弥陀山和法藏在武则天久视元年至长安元年(700—701)翻译,而刻版印刷亦当在这一年之中。《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》产生于荼婆罗门,传说在劫昆罗城之战中,荼婆罗门知道自己

見聞離五无間是時
除蓋障菩薩執金剛王
四王帝釋梵天王那羅
延摩醯首羅及天
龍八部等咸礼佛足
同聲白言我等已
蒙世尊加護福祿此
咒法及造塔法咸皆
守衛住持讀誦書寫
供養為護一切諸眾生
故於後時令彼眾
生悉得聞知不墮地
獄及諸惡趣我等為
報如來大恩咸共守護
今廣流通尊重恭敬
如佛无異不令此法而
有壞滅佛言善哉
善哉汝等乃能堅
固守護住持如是陀
羅尼法時諸大眾聞
佛說已歡喜奉行
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

图一，据罗树宝主编《印刷之光》翻拍

七天后俗命当终，特别恐惧，便去求佛。佛让他修理古塔，念诵神咒。他照办了，因之命根增长，并升于极乐国，最后成了正果。此后他更广说造塔之义及传诵咒法。因知此经从产生那天起，就有消灾延寿的功用。武则天之所以要在这个年份上命僧译刻此经，是因为她在圣历二年（699）二月以耄耋之年幸嵩山，并谒升仙太子庙，回銮便不豫，且每况愈下。武则天掌政前后，嗜杀成性，罪孽深重，生病畏死，便想消灾延寿，故急命弥陀山和法藏译刻此经。

4.《妙法莲华经如来佛寿品第十六》残卷《分别功德品第十七》全卷 唐武则天光宅元年至长安四年（684—704）刻本

1906年，在新疆吐鲁番发现了雕版印制的《妙法莲华经》卷五《如来佛寿品第十六》残卷和《分别功德品第十七》全卷。初归于新疆布政使王树枬，不久易手于日本江藤涛雄，最后由中村不折购得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日本著名版本学家长泽规矩也据文中有武则天时特有的制字，鉴定为中国唐代武周时期刻本。

5.《全唐文》卷六二四及《册府元龟》卷一六〇记载唐大和九年（835）剑南两川及淮南道刻印历日

“（大和）九年十二月丁丑，东川节度使冯宿奏：准敕禁断印历日版。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，其印历已满天下，有乖敬授之道。”《册府元龟》卷一六〇记载，前边文字与《全唐文》同，末多出“故命禁之”之语。《旧唐书》卷十七下《文宗纪》亦载“（大和九年十二月）丁丑，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。”大和九年即公元835年，表明在这一年之前，剑南两川及淮南道民间雕版印制历书已相当普遍。

6.唐司空图《司空表圣集》卷九杂著《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瓘化募雕刻律疏》记载唐武宗会昌五年（845）以前雕印《日光旧疏》

“今者以日光旧疏，龙象宏持，京寺盛筵，天人信受，口迷后学，竞扇异端。自洛城罔遇时交，乃焚印本，渐虞散失，欲更雕镌。惠瓘无愧专精，颇尝讲授，远亲信士，誓结良缘。所希龟鉴益昭，津梁靡绝，再定不刊之典，永资善诱之方，必期字字镌铭。”文中所谓“自洛城罔遇时交，乃焚印本”，当指唐武宗会昌五年

(845)的灭佛运动。据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四八《唐纪》六四武宗会昌五年秋七月条载:“上恶僧尼耗蠹天下……乃先毁山野招提、兰若,敕上都、东都两街各留二寺。每寺留僧三十人。天下节度、观察使治所及同、华、商、汝州各留一寺,分为三等:上等留僧二十人,中等留十人,下等五人。馀僧及尼并大秦穆护、袄僧皆勒归俗。寺非应留者,立期令所在毁撤。……财货田产并没官,寺材以葺公廨驿舍,铜像、钟磬以铸钱”;至八月壬午“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馀区,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,大秦穆护、袄僧二千馀人,毁招提、兰若四万馀区。收良田数千万顷。……寻又诏东都止留僧二十人,诸道留二十人者减其半,留十人者减三人,留五人者更不留。”在这次灭佛运动中,不但毁坏了很多寺院,还俗了很多僧尼,熔化了大批器具,收回了很多良田,东都洛阳原有的许多版印佛教经像也被付之一炬。这说明在公元845年以前,洛阳已有大量雕版印制的经像。而司空图为惠礪代写重雕《日光旧疏》疏文,据向达先生考证在他第一次来洛阳期间,即唐懿宗咸通末至僖宗乾符六年(873—879)之间,亦说明在这六年中,雕印经像又趋恢复,且必期雕印精到。

7.唐范摅《云溪友议》卷下记载唐大中元年至三年(847—849)纥干泉雕印《刘宏传》

“纥干尚书泉,苦求龙虎之丹十五馀稔。及镇江右,乃大延方术之士,乃作《刘宏传》,雕印数千本,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。”纥干泉,字咸一,雁门(今属山西)人。唐宣宗大中元年至三年(847—849),任江南西道(今江西)观察使。他雕印《刘宏传》数千本,就在此期间。表明九世纪中叶,江西已有了很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。

8.唐懿宗咸通二年(861)以前雕印《新集备急灸经》

法兰西图书馆东方手稿部所藏(P.2675)原中国敦煌莫高窟所出写本《新集备急灸经》末书“京中李家于东市印”一行,说明此写本《新集备急灸经》系由李家雕印本所从出。背面有咸通二年缮写的阴阳书、三年写的神灵药方,表明此《灸经》抄写时所依据的底本通常应该雕印在咸通二年之前。中国国家图书馆亦藏有此件的胶片。又法兰西图书馆东方手稿部所藏(P.2633)原出中国敦煌莫高窟之写本《崔夫人要女文》末亦书“上都李家印崔夫人壹本”,两李盖是同一家书铺。

9.日本僧人宗叡《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》中著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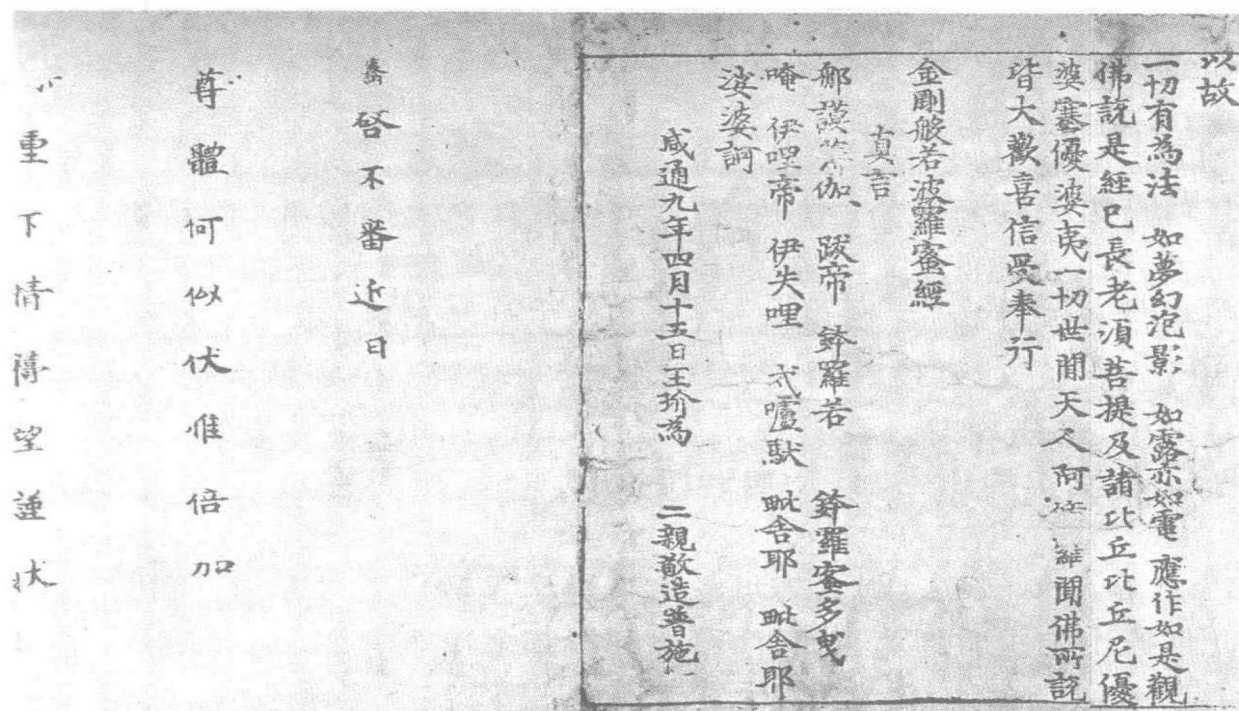
“《都利聿斯经》一部五卷……《七曜二十八宿历》一卷、《七曜历日》一卷、西川印子《唐韵》一部五卷,同印子《玉篇》一部三十卷。”宗叡是日本入唐高僧之一,他于唐懿宗咸通三年(862)来华,在中国居三年,于咸通六年(865)回步东瀛。他回国时带去经卷、历书、字书、韵书一百三十四部。其中虽只说《玉篇》、《唐韵》是西川雕印本,其所带佛经、历日亦未尝不是雕印本。唐玄宗天宝十年(751)陈州司法参军孙愐重新刊定《切韵》,更名《唐韵》。表明咸通六年以前,《玉篇》、《唐韵》这样多卷之书,川蜀都已经能够雕印了。

10.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一卷（后秦）鳩摩羅什譯 唐懿宗咸通九年（868）王玠刻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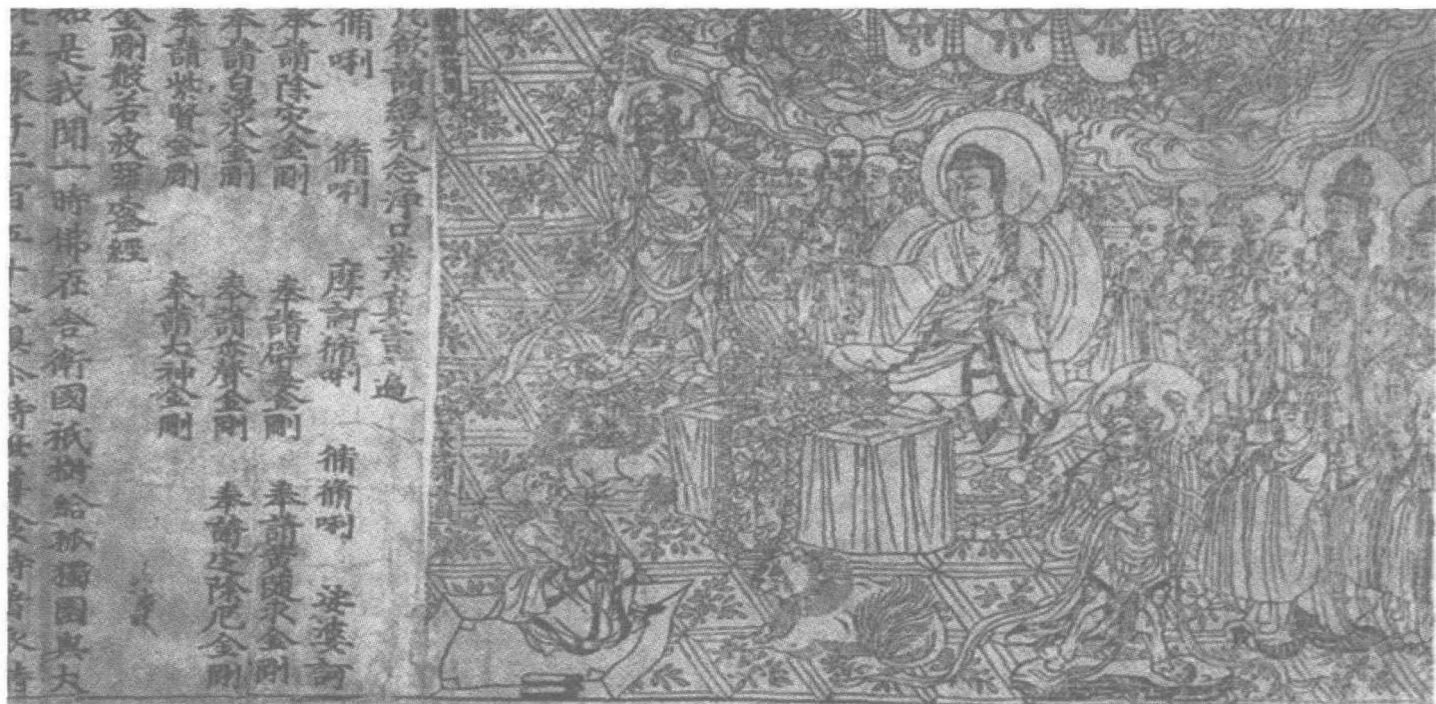
此經卷原出中國敦煌莫高窟，今藏不列顛圖書館東方部。全經作卷軸裝。卷首扉畫及正文框高 24 厘米。正文前是淨口業真言，凡五行。正文，包括首尾題名，凡 287 行。正文后又是真言，凡四行。最后落款一行。總 296 行，行 19 至 20 字不等。四周单边。全長 491.5 厘米。卷末鐫“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”題記一行（圖二），確證證明此經刻于咸通九年。卷首扉畫（圖三），演繹釋迦牟尼佛坐祇樹給孤獨園對長老須菩提及僧眾說法故事，構圖複雜，中心突出，布局合理，鐫刻線條流暢，人物形象端莊肅穆，各具神態。正文為端楷，渾朴厚重，氣勢磅礴。刀法穩健，行氣嚴整。麻紙印造，墨色純正。整個看上去，已是一件相當成熟的雕版印刷品。唐武宗滅佛后十五年，唐懿宗做了皇帝。《資治通鑑》唐懿宗咸通三年（862）評論說：“上奉佛太過，怠于政事，嘗于咸泰殿筑壇為內寺僧尼受戒，兩街僧、尼皆入預；又于禁中設講席，自唱經，手錄梵夾”，顯然佛教又得到大力提倡和發展，此時出現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的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當是歷史的必然產物。

11.唐僖宗乾符四年（877）雕印具注曆日

此件原出中國敦煌莫高窟，今存不列顛圖書館東方部。框高 24.8 厘米，全長 96 厘米。四周鐫有双边栏線。圖文并茂。麻紙印造。字體風格，雕印特點，頗似蜀中印刷品。歲首正月稍有破損，看不出是哪一年的曆書，亦無由判斷誰是這部曆書的雕印者。然其餘十一個月却完整無損，從閏二月小、三月大、四月小、五月大、六月小、七月小、八月大、九月小、十月大、十一月小、十二月大的情況看，正月亦當是大月。七月份最下栏鐫《推丁酉年五姓起造圖》，圖中鐫“今



圖二，據羅樹寶主編《印刷之光》翻拍



图三,据罗树宝主编《印刷之光》翻拍

年宫、羽得大利,起造拾财益人口。商姓小利,今年起造亦吉。徵姓起造害财。角姓切忌休造,凶。宫、徵、羽三月、九月墓,凶,吉子不用。商、角姓六月、十二月墓。”这段文字中既说“推丁酉年五姓起造图”,又说“今年宫、羽得大利”,表明此年就是丁酉年。按,唐代丁酉年,分别是贞观十一年(637)、万岁通天二年(697)、至德二年(757)、元和十二年(817)、乾符四年(877)。此件雕版印刷之历书,一直被中外学者推定为乾符四年这个丁酉。此为现今存世最早最为完整的历书。

12.唐王说《唐语林》卷七记载唐僖宗广明元年(880)以前江东民间刻印历书

“僖宗入蜀,太史历本不及江东,而市有印货者,每差互朔晦,货者各争节候,因争执,里人拘而送公。执政曰:‘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!同行经纪,一日半日,殊是小道。’遂叱去。”按,唐僖宗乾符二年(875),王仙芝在河南起事,黄巢在山东曹州聚众响应。乾符五年(878),王仙芝战死,巢为全军统帅。广明元年(880)攻克长安,即位称帝,国号大齐,年号金统。僖宗就在这一年为躲避此难出幸山南,逃往蜀中。表明公元880年以前,江东(即今安徽、江苏)一带也出现了印制发卖的历书,且印卖者因推算不精,朔晦有差,互相争执,乃至讼官。

13.中和二年(882)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雕印具注历日(图四)

此件原出中国敦煌莫高窟,今藏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。仅存残片。卷端大字镌题“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口”。其中“曆”字下半看不清,“曆”下所缺当是“日”字。第二行小字镌“中和二年具注历日,凡三百六十四日,太岁壬寅。”壬

寅,即中和二年。第三行镌“推男女九曜星图”,其下横镌“行年”二字。再下文字全阙。四周单栏。右边栏外墨书:“如有人要借用了,请知送回。”表明历书不一定要家家置备,常可借用,选择良辰吉日,适选农时,测算吉凶。这种借用历书的习俗,在中国广大农村延续了一千多年,直到新中国建国之初,此习在农村还在继续。樊赏家雕印的具注历,虽然只剩一残片,但其端庄凝重、形神俱似颜体风格,刀法稳健、一丝不苟的雕刻技巧,敷墨匀黑、浓而不滞的刷印工艺等,仍依稀可见,反映出九世纪下半叶,川蜀雕版印刷的水平已相当成熟。

14. 宋叶氏《爱日斋丛抄》卷一引唐柳玭《柳氏家训序》记载唐僖宗中和三年(883)以前成都雕印各类杂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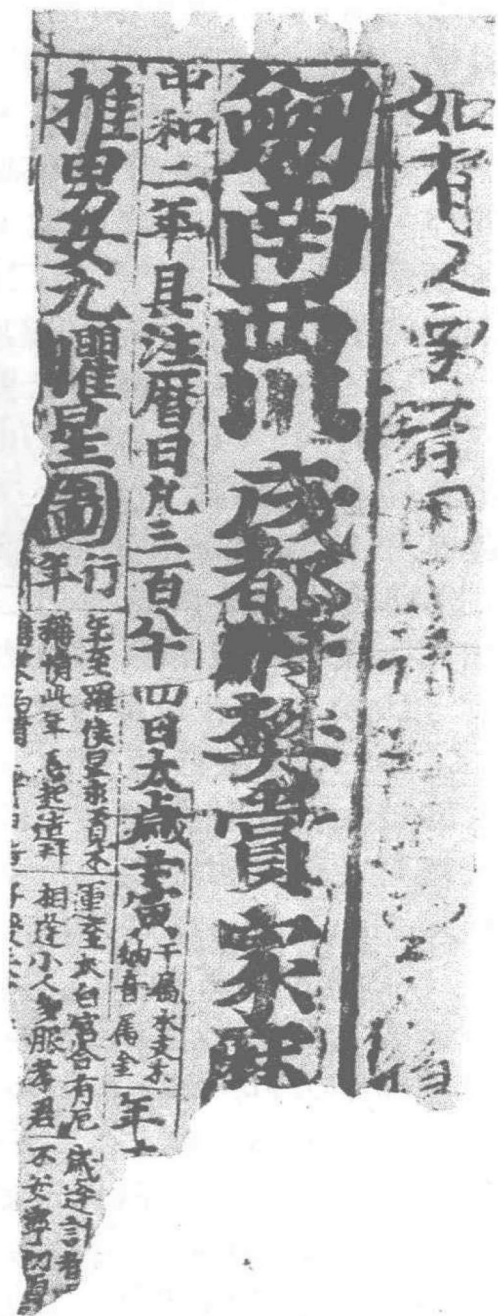
《爱日斋丛抄》卷一称:“中和三年(883)癸卯夏,鸾舆(指僖宗)在蜀之三年也。余为中书舍人,旬休,阅书于重城之东南,其书多阴阳杂占卜、九宫、五纬之流,又有字书、小学,率雕板印纸,浸染不可尽晓。”按,柳玭(?—894),京兆华原(今陕西耀县)人。柳仲郢子。明经及第,补秘书正字。中和初,至成都行在,历中书舍人、御史中丞。他在中和三年夏,利用旬休,阅书于成都东南。所见虽不是高文典册,但“率雕板印纸”,只是印纸浸染,质量不高。表明公元883年以前。成都的雕版印刷品已充斥市场。

15. 上都东市大刁家雕印历日

不列颠图书馆藏有原出自中国敦煌莫高窟的“上都东市大刁家太郎”雕印的历日。仅存八门图中的火门、风门、木门、金门方位残片。视其版印风格和印纸墨色,盖亦是九世纪的雕版印刷品。唐时长安京城有西京、中京之称。至代宗宝应元年(762),以京兆府为上都,故又有上都之称。上都的西市和东市,乃商贾云集之地,大刁家与雕印《新集备急灸经》的中京李家,都开书肆于东市,可能东市文化市场比较集中。

16. 公元九世纪雕印梵文《陀罗尼咒经》

1967年,陕西西安西郊张家坡西安造纸网厂工地唐墓出土梵文印本《陀罗尼咒经》。此经咒为方形,高27.8厘米,宽32.5厘米。框内高22.6厘米,宽22.9厘米。框内中心墨绘金刚力士抚慰一跪姿汉装男供养人头顶图像。图像四



图四,据罗树宝主编《印刷之光》翻拍

周环刻咒经十三行。框内四周绘画各种供品、手印和兵器。此经今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站。

17.公元九世纪雕印梵文《陀罗尼咒经》

1974年,陕西西安西郊柴油机械厂工地唐墓出土了梵文雕印本《陀罗尼咒经》残件,高27厘米,宽26厘米。四周镌花栏线。中心空白,盖为绘画图像所预留。右侧墨书“吴德口福”字样。环绕中心续刻梵文经文十三行。咒经外围刻印各种供品、手印和星座。此经原件今藏西安市文管会。

18.公元九世纪雕印梵文《陀罗尼咒经》

1944年,四川成都四川大学南近府河北岸唐墓出土了雕印本梵文《陀罗尼咒经》。框内高31厘米,宽34厘米。四周镌有栏线。中心刻印六臂菩萨坐于莲座之上,围绕中心环刻咒经十七行。咒经外围刻菩萨和手印。框外右首行镌“成都府成都县口龙池坊口口口口近(匠)卞……印卖咒本口口口”等字样,知其为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雕印。此经原件今藏四川省博物馆。

19.公元九世纪雕印汉文《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》

1975年,陕西西安西郊冶金机械厂工地唐墓出土了雕印本汉文《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》,高35厘米,宽35厘米。四周镌有栏线。中心墨绘施彩菩萨抚慰跪姿合拾女供养人图像。图像周围环刻汉文咒经十八行。框外环刻手印一匝。此经原件今藏西安市文管会。

20.唐末以前西川过家雕版印制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

法兰西图书馆东方手稿部所藏(P.2094;P.2876;P.3398;P.3493)、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所藏(S.5446;S.5451;S.5534;S.5544;S.5669;S.5965;S.6726)、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“有”字九号原出中国敦煌莫高窟之传抄本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,卷末都有“西川过家真印本”字样,表明此经抄写时所据底本是“西川过家”的雕印本。而这些经卷抄写的时间,在唐昭宗天复二年(902)至五代晋天福八年(943)之间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“有”字九号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卷末有“西川过家真印本”字样,又有“丁卯年三月十二日八十四老人手写流传”落款。丁卯是唐哀帝天祐四年(907),即唐代的最后一年。证明唐末以前,西川过家曾经雕印过《金刚经》。

21.唐末雕印《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》(图五)

法兰西图书馆所藏(P.3361)、不列颠图书馆所藏(S.8702;S.3728)原出中国敦煌莫高窟之《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》,是雕印本。卷子装。高20.1厘米,全长150厘米。麻纸印造,无边栏界行。印文凡五十五句。版面格式为每行分上下句,上下句之间空两字,以为间隔。全篇作韵文,每句七八字不等。文义通俗,明白易懂。镌刻字体端庄厚重,刀法剔透,是一件相当成熟的印刷品。佛教传入中国以后,为了宣传经旨教义,争取更多信徒,遂采取“僧讲”和“俗讲”两种形式,“俗讲”与中国固有说唱文学相结合,出现了所谓“变文”,此件盖即如此。圆鉴大师,无考。黄征、张涌泉《敦煌变文校注》(中华书局1997



图五

年)版校注(一)曰:“王重民原校:‘凡存三卷,原编号及校次如下:原卷,斯七,刻本;甲卷,伯三三六一;乙卷,斯三七二八,只缺末一句。’原录于篇题有‘左街僧录圆鉴大师赐紫云辩述’题款一行,校记云:‘此行原本无,据甲乙两卷补。’周绍良云:原题‘既已于《二十四孝押座文》之前冠以故圆鉴大师,则无必要再于次行另列题款,使形成重叠’。周先生认为甲、乙两卷有题款是抄手多事所致,并因而断定‘抄手所书并不是完全准确可靠’云云。……原校又云:‘斯 4472 有左街僧录云辩与缘人遗书,知云辩卒于广顺元年(951)。启(启功)云云辩与杨凝式同时,曾居洛,与妓女作诗嘲讽,事见宋张齐贤《洛阳缙绅旧闻记》。又伯三八八六卷一《美瓜沙僧献款诗》有右街千福寺内道场应制大德圆鉴的五言诗,在广顺前约早百年,当是另一圆鉴。此押座文刻于云辩死后,已经是五代末或宋初了。’”这里提出了两个“圆鉴大师”。云辩者,只是书写的题款,不足为据。且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所藏完整原件,篇题下并无此款,故所题完全有可能是后人所加,更不足为凭。比云辩早约百年,也就是九世纪中叶的“右街千福寺内道场应制大德圆鉴”,则很有可能是《二十四孝押座文》的作者。篇题已题“故圆鉴大师”,雕印此文时固当在其示寂之后,但怎么后,也还应当唐末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,在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曾见英、日两国合编之《中国早期版画》一书,该书考定此件,是九世纪的印刷品。九世纪,正值晚唐。近见方广钊先生,他则认为撰《二十四孝押座文》的圆鉴,当是五代的圆鉴。故此件究竟刻于何时,仍有不同意见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国家图书馆